

# 再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

朱 滋 源\*

## 摘 要

本文以新近發現的英國、法國、美國檔案，具體探索孫中山對外的策略，同時參以近年來學者的研究成果，再加上過去學界的研究論著，以及出版之史料，藉以重新整理與分析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文中發現：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應該分為對內的以及對外的兩部分。這兩部分在他的一生之中，都曾經有過變化；特別是對內的部分，前後有過五次轉變：從反滿的傳統觀念，過渡到兼反滿與親滿而有之的短時間的矛盾，再變成激烈的排滿主義，之後，又一百八十度轉彎，成為五族共和論，最後變成中華民族說。對外的部分則從妥協性轉成激烈的公開反帝，但私下仍與列強交好。最後，本文更深入探討其主義的核心部分，發現仍有不變的主脈存在，此即「國族主義」以國家為始終如一的關懷重點，而非泛稱的，而且內容模糊、方向不清的「民族主義」。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 再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

朱 滋 源\*

## 前 言

- 一、早年的種族觀念
  - 二、革命時期的排滿主義
  - 三、民國初年的民族融合說
  - 四、晚年的聯俄容共與反帝
- 結論：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核心成份

## 前 言

常人言及孫中山，多持肯定的態度。對於他的思想，也多從正面的角度加以確認，並且爲他說話；把或許有些不甚連貫或自相矛盾的地方，做合理解釋，使彼此呼應。此種作法，對了解孫中山有相當大的幫助，但對於思想研究，特別是從學術的，就事論事的，正反兩面都須探討的要求而言，則難免有所欠缺。而學術研究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的功能，也相對打了折扣。更糟的是學術與政治之間，至少在研究孫中山的時候，就沒有明確的界限。

本文希望能爲孫中山研究的學術中立性與超然性，以思想史研究法，重新做一點工作，因此在這一篇裡頭，大膽地兼用正、反兩面的手法，平心靜氣地，也毫無隱瞞地，用新近發現的史料，參考甫行問世的學術論著，確實而具體地把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內涵，既做橫面的剖析，又做縱面的追蹤；既觀察其思路的理則性，又探尋前後的變化。

---

\* 本文撰寫過程，曾與賀凌虛、孫廣德、王爾敏、李恩涵、周繼祥、張志銘、李炳南、林啓彥、黃自進等教授交換意見，獲益良多，特此致謝。

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內涵，在其一生當中，有著多次的變化，而且變化幅度十分之大，甚至是一百八十度朝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由於身處中國數千年君主專制崩壞，與民主共和政體初肇的階段，因此，孫中山的一生跨越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既然跨越兩個時代，其思想必然深受不同時代的影響，而有不同的內涵。整體的思想如此，民族主義為其中的部分，自然不能例外。

職是之故，本文決意在孫中山民族主義之中，找尋其於不同時代的特色。作者發現，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自年青時期到去世，都在變化之中。表面上看孫的思想，幾乎可以說是隨著時光的變動而變動的。本文立意找出這些變化，並且加以檢討。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然而這一系列的變動之中，是否仍舊保留著不變的成份或者隱藏著某種不變的理路？則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本篇囿於篇幅，祇能點到為止。希望將來再進一步深論。

過去人們談中國的民族主義，不論是在中國境內或在外國，常跟隨漢族的說法，從漢族的立場出發，以漢人的觀點為觀點，以致忽視其他少數民族的立場，並且習以為常，司空見慣。很少人能從少數民族的觀點來檢討，特別是三百多年來備受攻訐的滿族的觀點。

過去，人們談中國近代史，也有一個習慣，喜歡將滿族等於清廷，將清廷等於清朝政府，將清朝政府等於專制的，甚至封建的政府。清末以來這種現象益加普遍。許多漢人都這麼想。民國初年，情況略有好轉，但相差不多。甚至到了今天，大部分人的觀念都仍舊如此。其實，這些對等推論，每一個都是錯誤推論，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

本篇探討的對象：孫中山先生，雖被尊為中華民國國父，其民族思想影響中國人已達一整個世紀，卻也犯了同等的謬誤。之所以如此，主因民族主義是種高情緒、高感性且少理性的意識形態。由於夾雜著情緒，又築基在種族與種族、種族與民族、還有民族之間複雜的互動歷史之上，使原有的正面意義與負面情緒糾纏不清。處在這種局面裡頭，當局者包括孫中山在內，實難自外，更不可能保持完全的冷靜與客觀。另外，清末以來，中國大革命方興未艾。<sup>①</sup>百年之中，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正劇烈變遷著。民族思想夾在高度複雜詭異的情境裡頭，更

<sup>①</sup> 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容易扭曲變形。孫中山的民族思想，就在這麼一個情境中產生，因此也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孫中山的民族思想，可分對內與對外兩個部分。其對內者，思考中國境內以及邊境上許多種族（或民族）彼此之間的關係；其對外者，以中國為一個單元，考慮其與外國民族之間的關係。本文將兼而論之。<sup>②</sup>

孫中山享年六十歲。在一甲子的生命當中，孫的民族思想有過幾次轉折，大致上可以分作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自年幼至中日甲午戰爭，第二階段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第三階段自民國元年至五四運動，第四階段自民國九年至十四年，爰依序分為四個部分，逐次加以論述：

## 一、早年的種族觀念

### （一）求學時期

孫中山出生於一八六六年。當時中國社會，秘密會黨林立。<sup>③</sup>太平天國雖然甫經撲滅，但其反滿精神滋漫。太平軍餘黨亦零散各處，特別是兩廣一帶。<sup>④</sup>他們化整為零，在兩廣及中越邊區，具有不可輕視的力量。<sup>⑤</sup>由於洪秀全是廣東人，洪秀全的傳說，一直為廣東人所津津樂道。

太平天國以最典型的漢族華夷之辨作為理論來申討清廷。其「誓師檄文」曰：「嚴夷夏之防，伐暴救民。」<sup>⑥</sup>除嚴分夷夏之外，又將夷人之統治視為暴政。認為中國經過清廷二百年統治之後，「漢唐之衣冠已渺」<sup>⑦</sup>，而且在「奉天討胡檄文」中，更謂：「予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國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慨自有明失政，滿洲乘釁混亂中國，盜中國之天下，奪中國之衣食，淫虐中國之子女人民。」<sup>⑧</sup>字裡行間，仍將滿人視為胡虜，而

② 本人原已針對孫中山民族主義對內的部分寫過一篇小文章。詳見：朱滋源，「孫中山對內民族主義的轉折與困惑」，滿族文化，期 15，1991年 6 月，頁 4~10。

③ 劉錚雲，「清代會黨時空分布初探」，台北，中研院史語所，中國近代社會與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民國 79 年 7 月 15 日。

④ 陸寶千，論晚清兩廣的天地政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64 年。

⑤ 朱滋源，「同治中興在廣西：劉長佑巡撫的治績」，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7 年 6 月，頁 509~548。

⑥ 「誓師檄文」，文出：「太平天國文鈔」，太平天國詩文鈔，台北，文海，頁 29。參見朱滋源，中國近代民族思潮（出版中），第一篇第三章。

⑦ 同上。

⑧ 「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太平天國文鈔」，同上，頁 32。

非中國的一部分。

此種說法，事實上已與當年的中國情況不同，蓋滿族入主中原兩百年之後，相當部分已與漢族等混血；中國人的血液中，自有「胡虜」的成份。滿洲統治階級化入中國者亦不乏人，想嚴分滿漢頗不容易。<sup>⑨</sup>但事實儘管已經不同，民間的想法依然是老舊的反滿的一套。

民間的傳說，加上散兵、游勇、會黨的宣揚，使得反滿的情緒不但持續，而且散播到了基層。孫中山在這樣的環境之中長大，耳濡目染，接受了以漢族為中心，以反滿為精神的民族思想。<sup>⑩</sup>

孫中山對外的民族思想，也與國內絕大部分人不同。對於外族的欺壓中國人，孫中山從小開始就有許多感受，特別是一八七九年開始在檀香山 Iolani School 就讀六年級（按：依當地學制，小學須八年畢業。）以後。由於土著同學時常拿他的髮辮開玩笑，中山不勝其擾，起而反抗，並且深深體會到：「這髮辮不過是中國所受許多恥辱的一種，我們應該立刻將許多恥辱一起去掉。」<sup>⑪</sup>種族以及國家的恥辱，在美國人排華、<sup>⑫</sup>夏威夷人也排華的惡劣環境中體會最深。但此係孩提時期的感覺，列強如何壓迫中國，要等他長大回到中國服務才能體會。

列強予中山的感覺可以說酸甜苦辣兼而有之，但在青少年以及青年時期似乎又有變化，轉成較多甜美的成份。從 Iolani School，到 Oahu College，以至香港的 Central School, Canton Hospital 的南華醫校，以及雅麗士醫院附屬的西醫書院前後總共十四年的時間，均接受外國式的教育，得到外國學者與傳教士等的啓蒙。<sup>⑬</sup>孫中山在宗教信仰上做了抉擇：不顧家人的反對，選擇了基督教，同時積極參與教會的活動，不僅參加詩班與鄉村醫療佈道，並於一八九一年組成「教友培道會」。<sup>⑭</sup>受外國人教育，信西方的宗教，使孫中山的思想與信仰充滿外國的色彩。

⑨ 滿人入關以後，與漢族廣大群眾混居，時間一久，頗多深染漢俗。其在上者，如以清帝為首深入漢文化之內而卓然有成者，頗不乏人。康熙、雍正、乾隆諸帝，均有極深的漢文造詣。滿族文學家之擅長漢文詩詞者更不計其數。其下焉者，分散各地，更易在血統上、文化上相混和。因此到了今天，即使是東北地方，其人口的大多數，竟然並非滿族，而是漢族。東北如此，其他地區更不在話下。

⑩ 桑咸之、林翹翹，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頁265。

⑪ 關於孫求學及行醫時間思想的本質為何，李金強有精闢分析。請參見：李金強，「孫逸仙博士之早期思想——農業改良言論探討（1887~1895）」，香港，珠海學報，期13，1982，頁280~281，286~287。

⑫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孫中山全集，北平，中華書局，1981，頁8~18。

⑬ 林百克，徐植仁譯，孫逸仙傳記，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民30，頁30~31。

⑭ 參見：劉伯驥，美國華僑逸史，台北，黎明，民73，第十篇，「排斥華僑」；第十一篇，「驅逐華僑」；第十二篇，「殺害華僑」。

陶冶在列強各國的文明與進步之中的孫中山，似乎不至於毫無條件就產生排外、反帝的民族思想。

## (二) 甫入社會時的矛盾

孫中山雖自小即深染漢族反滿思想，但西醫書院畢業，甫入社會的時候，在短暫的兩年之中，他的民族思想則相當矛盾而複雜，一方面既有反滿之心，二方面更含報效朝廷，為國獻替之意。<sup>⑮</sup>在矛盾之中，也與一般漢人知識分子相同，希望書生報國，學而優則仕。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兩年（一八九四年二月），與陸皓東北上，想爭得一官半職，在嶺南地區種桑養蠶，改良農業。<sup>⑯</sup>

這個時候的孫中山，一面在翠亨、澳門等地行醫、賣藥，一面遊走港澳，與陸皓東、陳少白、楊鶴齡、尤列相善，結納鄭觀應，熱衷討論國家大事與世界情勢。<sup>⑰</sup>對於清廷，他無意推翻；對於滿人，除言論外，並無實際的仇恨行動。換言之，矢志革命以前的他，雖然言談間偶發仇滿甚至革命之論，尚無鋌而走險的念頭。不過，確定的是此時絕無滿漢一家觀念。精細點說，在政治上他並未嚴分滿漢，雖然在民族上，已有滿漢不同族，以及滿人壓迫漢人等等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

一八九四年六月，他透過關係，輾轉上書李鴻章，並希望與李相當面晤談，鼓動李鴻章設法使兩廣獨立。可惜不得法，敗興而歸。這一次失敗，是孫中山一生最重要的轉捩點。從此以後，孫逐漸放棄改革，轉採激烈革命之路。<sup>⑱</sup>而其激烈的民族主義，也從這個時候開始形成。同年七月，甲午戰爭爆發，十月，孫赴檀香山。十一月，組興中會，由劉祥、何寬擔任會長。<sup>⑲</sup>宣誓以「驅除韃虜」之類的激烈手段來振興中華，創建民國。<sup>⑳</sup>

<sup>⑮</sup> 華中興，中山先生政治人格的解析，台北，正中，民 81，頁 47~53。

<sup>⑯</sup> 同上，頁 59。

<sup>⑰</sup> 吳相湘編撰，孫逸仙先生傳，台北，遠東，民國 71 年，頁 61~63。

<sup>⑱</sup> 孫中山會想藉李鴻章之力使兩廣獨立。詳見：邱捷，「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及策動李鴻章『兩廣獨立』新探」，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0。他的自和平改革轉採激烈革命路線，也并非立即形成的。他成立興中會之後，曾「把康有為、吳瀚濤、和曾紀澤的兒子與他同列為興中會的四大統領」。詳見：林增平，「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歷史研究，1987 年，期 1，頁 21。此係過渡階段，雖然他的這種想法顯然一廂情願，但可見在他的腦海裡，主張維新改良的人士和清朝的世家官宦，也可以與他共事。

<sup>⑲</sup> 馮自由，革命逸史，集 4，頁 3。

<sup>⑳</sup> 「興中會會員誓詞」，國父全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民國 71 年，再版，冊 2，頁 885。但大陸學者林增平不以為然。他認為興中會開始時，「壓根兒缺乏提出和通過這份誓詞的思想基礎。」（「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歷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頁 17。）林氏該文極具說服力。依林氏研究，孫中山當時未提「驅除韃虜」之說，因為當時他還想和世家官宦合作，而且，他祇想在兩廣建立政權。（頁 20）由於祇用兩廣為基地，尚無必要把滿人等韃虜從中國整個趕出去。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孫中山確已展開武裝流血革命。

至於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的倫敦蒙難，受困清廷公使館，由於英國師友、政府、新聞界的大力照顧支援，不但救了他的生命，而且透過至少二十家英國報紙的宣傳，接受恩師康德黎醫生等人的啓迪，以及康德黎爲他代筆撰寫 *Kidnapped in London* 等等，使他名揚全球，<sup>②①</sup> 同時更了解歐美先進國家最新的學說，對中國的落後，有進一步的認識，進而加深抗清意識，以及對外國人，特別是英國人眷顧營救的懷念。這一連串的特殊機遇，所塑造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內涵，與長期生活在國內的中國人相比，自然有著極大的不同。

## 二、革命時期的排滿主義

從興中會成立，到辛亥武昌起義，孫中山所闡揚的，基本上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sup>②②</sup> 或者「小民族主義」。<sup>②③</sup> 他以漢族爲中心，將其他民族自漢族劃開，特別是滿族。一九〇〇年，他說「竊某等十數年來，早慮滿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國，延及友邦」。<sup>②④</sup> 而滿政府之患中國，並非始自清末。一九〇四年，又說滿清入關以來犯下許多錯誤。他條列十大虐待漢人的史實，<sup>②⑤</sup> 並堅主「驅逐這韃靼到吾們的區域之外」。<sup>②⑥</sup> 在這樣的主張背後，孫無意中預設滿漢不同族以及滿族等「韃靼」並非中國人等偏離史實的立場。因此，要把漢族以外的這些種族趕出漢族所居住的區域。似乎，他心目中漢族所居住的區域，並不包含韃靼人（滿、蒙、回、藏似乎都是韃靼）所居住的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而這些地方面積廣大，爲整個中國的一半。

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驅除韃虜」仍爲會員誓詞中四大口號裡的第一個口號，顯見會員們對這個主張的認同。其程度之高，無法由其他的三個口號所取代。中國同盟會總章第二條，亦明言「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孫同時指使民報社同仁撰文，對滿族大加撻伐。<sup>②⑦</sup>

<sup>②①</sup> 參見：J. Y. Wong, *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3.

<sup>②②</sup>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務，民國58年，台6版，頁603。

<sup>②③</sup>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新民叢報*，轉載於：*飲冰室文集*之13，台北，中華書局，民國49年，再版，頁74。

<sup>②④</sup> 「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並擬訂平治章程請轉問各國贊成書」（1900年），*國父全集*，冊1，頁760。

<sup>②⑤</sup> “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 *國父全集*，冊5，頁116~117。

<sup>②⑥</sup> 譯文見*國父全集*，冊2，頁73。

<sup>②⑦</sup> 朱滋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台北，中研究近史所，民國74年，第二章，「民族革命論」。

從國際法的觀點，他們否定滿族為中國人，無意中犯下理論上的嚴重錯誤，因為既然滿漢並非同一民族，且滿洲地方也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sup>⑳</sup>那麼滿族大可脫離漢族而去，滿洲也可以自中國領土劃出。更何況所謂「韃靼」，指的並不僅限於滿族。假如依照他們的口號去嚴格推論，則除了漢族之外的所有其他種族也可以脫離，其居住地也一樣可以自中國領土中劃出。<sup>㉑</sup>這是就理論言。<sup>㉒</sup>

就實際來說，孫中山以及同盟會同仁之所以如此激烈，完全是策略運用，目的不在種姓的發揮，而在推翻滿清。滿清一旦推倒，原持偏狹的民族主義就可以休矣。因此不能純從理論來推敲。顯而易見，孫中山的目的，自不在創立民族學學說，也不在取得國際法上理論的圓融（雖然他們也談國際法），<sup>㉓</sup>而是武裝革命。武裝革命所依賴的，主要是暴力與情緒，而不是邏輯與理性。<sup>㉔</sup>

即使如此，孫仍盡可能兼顧理論與實際。一九〇五年的第一口號，翌年就公開修正。在民報創刊一週年的大會上，他公開否定種族復仇主義，並且進一步解釋民族主義的真意。<sup>㉕</sup>他說：「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sup>㉖</sup>把先前的全面否定，做大幅度的修正，認為民族革命並不是要消滅滿洲民族。三年之後，孫在舊金山成立同盟會支部，又進一步調整誓詞，把第一句「驅除韃虜」改為「廢滅韃虜清朝」。<sup>㉗</sup>他這麼一改動，縮短了理論與實際之間的差距。使革命的對象，從漫無邊際的整個少數民族轉移開來，直接指向「清朝」，不但範圍大大縮小，而且箭頭也對準了。另外，又向蒙古等族請援，以「共伸」討滿，<sup>㉘</sup>增加革命的力量。

但是私底下孫中山的言論與書信中，仍舊充滿情緒性的排滿字眼。其在海外成立的機構，即使在一九〇六年底以後，仍然使用非常情緒性的字眼來形容清廷。例

⑳ 成章，「論滿洲當明末時代于中國為敵國」，民報，號 20，頁 1~21。

㉑ 朱滋源，「孫中山與胡志明民族主義的比較」，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廣東翠亨，1990 年 8 月，頁 5~6。

㉒ 參見拙作：同盟會的革命理論，頁 68。

㉓ 如胡漢民曾在民報第 6 期到第 13 期中大談國際法。

㉔ 參見拙作：「孫中山與胡志明民族主義的比較」，頁 6。

㉕ 王忍之，「孫中山的政治思想」，孫中山研究論文集，1949~1984，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頁 528。

㉖ 「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1906 年 12 月 2 日，在民報成立一週年紀念演講。詳見：民報，號 10，頁 83~96，孫中山的演說。

㉗ 「舊金山同盟會支部成立誓詞」。

㉘ 「蒙漢結合共伸討滿宣言書」（1908，4），民報，號 20。



如在古巴的同盟會支部「三民閱書報社」於一九一一年所印發的宣傳小冊。<sup>⑳</sup>

由於這個階段主要是藉著排滿情緒來推動革命，雖然措詞既激烈又不合理，但是煽起了無法抗拒的情緒，終於把滿清推倒。偏狹的種族情緒是孫中山這個階段的對內民族主義最大特色。由於它達到了目的，它的存在，具備了高度的「工具理性」。

至於對外的民族思想，孫中山在開始發動革命時，曾經表示中國革命將達到三層目的：「拯救中國四億的蒼生，雪除東亞黃種人的恥辱，恢復和維護世界的和平和人道。」<sup>㉑</sup>首先是針對中國，其次為的是亞洲的黃色人種，最後則及於地球上整體人類，為了這些人的福利，他把矛頭都指向列強。他早在同盟會成立之前，即明白指出：「中國終究要成為那些爭奪亞洲霸權的國家之間的主要鬥爭場所。」<sup>㉒</sup>謂「天下列強高倡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辟土為心；五洲土地已盡為白種所併吞，今所存者，僅東亞之日本與清國耳。」<sup>㉓</sup>在清廷統治之下，中國正遭逢列強的瘋狂侵略，極有滅種之虞，孫中山目睹此一情境，自無忽視之理。<sup>㉔</sup>

然而事實證明，孫中山在這個時期，縱令曾經寫過批評列強的文章，但是並無濃厚的反帝意識，他對列強的態度，充滿了「妥協性」。<sup>㉕</sup>他以及其他革命同志雖然看到「西方人之禍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滿洲」。<sup>㉖</sup>但是，在辛亥革命階段，始終沒有提出明確的反帝口號，<sup>㉗</sup>只是用「世界和平」、「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sup>㉘</sup>等詞句，來代替反帝的口號。他們甚至還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sup>㉙</sup>似乎對日本的侵略中國毫無警覺。

孫中山此一時期不但不反帝國主義，而且還主動要求列強贊助他，使革新中國的目的得以實現。他要求日本浪人及政府的幫助，接受日本的政治獻金，在後來對

<sup>⑳</sup> 該小冊仍以「滿虜——中國」相對立的語氣來宣揚覆滿革命。詳見：黃鼎元編著，「駐古巴中國國民黨黨務概觀」，轉錄自：蔣永敬編著，華僑開國革命史料，台北，正中，民69，頁213~214。

<sup>㉑</sup> 宮崎滔天著，林啟彥譯，三十三年之夢，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頁123~124。

<sup>㉒</sup> 孫中山全集，卷1，頁248。

<sup>㉓</sup> 同上，頁260。

<sup>㉔</sup> 黃彥，「關於世界新秩序的構想——論孫中山的『世界大同』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孫中山研究所編，辛亥革命與孫中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頁155。

<sup>㉕</sup> 從孫中山於一九〇三年所寫「支那保全分割全論」，可知孫在理性層面確實已然清楚列強壓迫中國的情形，但孫的反帝意識一直不曾直接而濃烈地提出來。參見：桑咸之、林翹翹，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同前，頁264~268。

<sup>㉖</sup> 章太炎語。參見：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上），頁264。

<sup>㉗</sup> 林家有、秦通海，「論同盟會的民族主義綱領」，民族研究，1983年期1，頁36。

<sup>㉘</sup> 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民報，期3，1906年，4月5日初版，4月18日再版，頁22。

<sup>㉙</sup> 同上，頁17。

日本侵華貢獻極大的黑龍會禮堂召開同盟會大會。也要求法國政府資助，在長江以南建立一個國家。<sup>④⑦</sup>並且爲使法國軍方與政府信得過，更指派黨員胡毅生、黎仲實等，陪同法國軍官 Captain Claudel、Brevet – Capitaine Vaudescal 等深入中國各地，察看清廷軍事的佈置情形。<sup>④⑧</sup>此種爲了推翻對方，而把自己國家虛實「介紹」於外國軍人的作法，很難說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惟若改從政治思想的角度來看就容易了解，因爲孫中山此時所想的，並非國家爲何的問題，而是在革命策略上如何運用，才能爭取奧援，在武裝鬥爭上致勝。

職是之故，進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其民族思想的對內的以及對外的成份，恰可以用「民報」第三期（1906年4月5日出刊）的第一篇文章「民報之六大主義」來代表。<sup>④⑨</sup>該文舉出此六大主義，並分爲對內與對外兩類。其對內者有三，曰：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建設共和政體、土地國有；其對外者有三，曰：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主張中日兩國之國民的連合、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最後，該文總結這六項主張，認爲同屬一個主義，這個主義，就是「革命」。<sup>⑤⑩</sup>在這個主義裡，包含了「革命所挾持之目的，所預備之實力，及其進行之事業，不可不避之手段。」<sup>⑤⑪</sup>換句話說，爲進行革命之大業，在政策、戰略、戰術上應考慮許許多多的因素，因此，對外發佈爲主張之時，必須不能祇顧理論是否圓融，更要慮及實際之是否可行。若從政治思想上的民族主義觀點來看孫中山，就需要兼顧理論與實際，也就是要了解其主觀的方向與客觀的局限。

根據這個立場來重新檢視六大主義，則可以看出有些屬手段，有些則屬目的：屬於目的者，有建設共和政體與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屬於手段者，有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介於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則有土地國有與主張中日兩國國民連合兩項。若就民族思想的觀點來看這三類的主義，則與對內民族主義直接有關者，並未之見；與對外民族主義有關者，則有兩項，一個是要求各國贊成革命，另一個特別側重日本與中國的國民的合作。不論是要求各國贊成革命，或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連合，在「民報」宣傳文字的表面，都看不出任何

<sup>④⑦</sup> Jefferey Barlow, *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sup>④⑧</sup> *Op.cit.*, pp.61~62. 陪同法國軍官多人分別潛赴大陸各地的有哥老會的弟兄以及同盟會的若干重要幹部。

<sup>④⑨</sup> 「民報之六大主義」（1906），民報，期3，頁1~22。

<sup>⑤⑩</sup> 同上，頁22。

<sup>⑤⑪</sup> 當然，在策略上不提反帝，而以低姿勢來要求列強協助，是否在效果上會比一面批判帝國主義，一面故示和好還要來得有效，則是個問題。詳見：朱滋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頁93。

反帝的痕跡。

由此可見孫中山民族主義的表現方式，應該精細地分出理論與實際、目的與手段等面向，並且要將這四大變項相互交叉彼此檢視，而不可單從文字表面來了解。②就文字表面來看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很容易歸結為激烈的排滿論以及對反帝的忽視。但就實際的運作而言，則排滿祇是工具，其目的在近期為顛覆政府，而遠程則在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忽視反帝及對帝國主義者的妥協，則完全是權宜性的應用，是過渡的。實際的情況應該是兩者兼而有之：列強侵我、欺我之部，孫中山要加以反對；列強之有助我強盛之部，自無妄予反對拒斥之理。

### 三、民國初年的民族融合說

武昌起義成功之後，還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城的孫中山，決定最先要透過外交途徑，呼籲各國支持革命。從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他從美國轉赴英、法，同時發表「通告各國書」。<sup>③</sup>其內容與「革命方略」中的「對外宣言」基本相同。原則上肯定「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sup>④</sup>換句話說：孫中山當時雖然對於帝國主義列強侵華的危機有一定的認識，並對不平等條約表示不滿，但未提出『廢約』思想，反而對外宣稱承認那些不平等條約。<sup>⑤</sup>孫中山這種作法，受到大陸學者普遍的質疑。<sup>⑥</sup>認為孫中山此時不主張廢約，並不是單純的策略性考慮，而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軟弱」的結果。他們批評道：<sup>⑦</sup>

僅把它（未主張廢約）看成是個策略問題是不全面的，與其說它是一個策略問題，還不如說它是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軟弱而不敢與帝國主義列強作堅決鬥爭的表現。他們一方面感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另一方面又看不到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反帝潛力，不去更不敢去放手發動群眾，將人民群眾自發鬥爭的涓涓細流匯合成波瀾壯闊的強大怒潮，因而也就不敢明確提出「廢約」

② 有學者亦持此觀點，認為：孫中山並非柏拉圖式的政治家，而是「實事求是」的理論家，而非一死守理念的思想家。詳見：胡春惠，「孫中山對聯邦論的認同及其演化」，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0，頁6。

③ 民立報，1911年11月16日。該文轉譯自「南華早報」。

④ 孫中山全集，卷1，頁310。

⑤ 黃德發，「孫中山廢除不平等條約思想研究：兼論孫中山後期的對日態度」，孫中山研究，輯2，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頁245。

⑥ 例如李澤厚亦提出類似的討論。詳見：李澤厚，「論孫中山的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谷風，民76，三版，頁478。

⑦ 黃德發，同前，頁250～251。

口號，與殖民列強公開抗爭。

這種說法，除犯了以今非古之毛病外，又不明政府的實際運作，不知道政府的繼承包含了條約的繼承，以至於濫套民國史教條，誤解了孫中山。更何況當時中國所最迫切需要的，完全不是反帝國主義這回事，特別是在民國初肇之時。

#### (一) 民國初肇

早在十九世紀中葉，蒙古即發起「獨貴龍」運動，<sup>⑤⑧</sup> 武裝保衛家鄉，驅逐墾務官吏，同時阻止土地丈放。一九〇六年起，東蒙古又掀起武裝暴動。其目的除自保外，又反對漢人北進及外人入侵。<sup>⑤⑨</sup>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義以後，各省紛倡獨立。十二月一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也宣布獨立。西藏方面，達賴十三輩立即跟進，驅漢官、逐漢軍，對外先聯俄以拒英，復親英而離華。<sup>⑥⑩</sup> 英人慫恿之下，亦呼應外蒙，號稱獨立。在民國成立以前，這兩個地方已躍躍欲試，明言獨立他去的意願。

民國紀元以後，原來未予正視的民族問題開始浮現出來。民初政局不穩，漢族內部自亂陣腳，正予少數民族可趁之機。再加上列強慫恿，多有亟欲獨立他去者。

如何對付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變成一個相當複雜而棘手的問題。但孫中山此時為混亂的時局所困，無暇旁及。此時孫對內的各種民族學說，有人說是他民族主義發展「過渡時期」的主張，<sup>⑥⑪</sup> 並不是最重要的部分。當時的重點在爭取列強的承認與援助。因此，「五族共和」以及「五族一家」的說法，在民國元年就提出來。元旦，孫就任臨時大總統，宣言：「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論調大異從前。驅除韃虜說「功成身退」，且夕間被完全遺棄。<sup>⑥⑫</sup>

民國元年三月三日，公開後的全盟會舉出九條政綱，第二條為「實行種族同化」。而九月間，孫中山應邀演講，公開指出：「民國成立，五族一家，地球所未有，從古所罕見，洵為盛事！」<sup>⑥⑬</sup> 並給予極高的期許。他接著說：「但願五大民族相愛相親，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sup>⑥⑭</sup> 四天之後，他又說：「今日中華民

⑤⑧ 「獨貴龍」的名稱源於蒙古語「各歸拉耶」，有「圍住」、「環形」的意思。其成員開會時，按環形席地而坐；簽名時，也作環形，因此命名。

⑤⑨ 蒙古文學簡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頁262。

⑥⑩ 牙含章，達賴喇嘛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98。

⑥⑪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78年，頁131。

⑥⑫ 朱滋源，「孫中山對內民族主義的轉折與困惑」，同前，頁6。

⑥⑬ 「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1912年9月3日），國父全集，冊2，頁258。

⑥⑭ 同上，頁259。

國成立，漢滿蒙回藏五族合為一體，革去專制，建設共和，……實中國數千年來歷史所未有。」<sup>65</sup>再過十天，復於北京廣濟廟與八旗人談話，也指出：「現在五族一家，各於政治上有發言之權。……凡我國民，均應互相團結，以致共和政治於完善之域。」<sup>66</sup>

民國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此期間，民族自決之說風行全球。當時主張民族自決者，以列寧與威爾遜為最著。列寧早在 1913 年即草成民族自決的文章。<sup>67</sup> 1916 年月，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一文。<sup>68</sup> 該文開宗明義，宣稱「社會主義取得勝利以後，必須實行充分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實現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離權。」他強調各個民族都應該具有分離的自由，沒有分離自由，自由聯盟便是騙人的鬼話。<sup>69</sup> 由於當時俄國革命尚未成功，列寧的呼籲未立即引起注意。1918 年 1 月，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其中有五條直接涉及民族自決，一條主張重視各殖民地的要求。<sup>70</sup> 威爾遜的呼籲，立即引起廣大的迴響，其中包括當時在巴黎修飾照片的胡志明。胡受威爾遜鼓舞，要求面晤威爾遜，惜未能如願。失望之餘，興起自救越南的決心。<sup>71</sup>

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說雖於提出後受到列強抵制，卻被許多未開發國家，特別是列強的殖民地奉為正臬。「安南、緬甸、爪哇（印尼）、印度、南洋群島以及土耳其、波斯（伊朗）、阿富汗、埃及與歐洲的幾千個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覺悟……不約而同，自己去實行民族自決。」<sup>72</sup> 於是乎，民族自決成為 20 世紀上半頁，特別

<sup>65</sup> 「合五族為一體建設共和」（1912 年 9 月 7 日），國父全集，冊 2，頁 264~265。

<sup>66</sup> 「五族互相團結共和之目的乃可達到」，國父全集，冊 2，頁 826。

<sup>67</sup> Jean Lacouture, *Ho Chi - Minh: A Political Biography*, trans. by Peter Wil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 225.

<sup>68</sup> 列寧全集，卷 22，頁 137~150。

<sup>69</sup> 同上，頁 137。請注意，列寧說的是「分離」的自由，究竟分離的具體意義是什麼呢？該文之中，列寧不曾明言，但似非「獨立」之意。

<sup>70</sup> 第九條：完成義大利的民族統一；

第十條：奧匈帝國中各附屬民族應予以自決的權利；

第十一條：巴爾幹各民族應給予自決權；

第十二條：土耳其帝國中各民族應給予自決權；

第十三條：波蘭獨立。

第五條：各殖民地的要求，應予公平調查。

<sup>71</sup> 連胡志明本人都為此躍躍欲試，巴黎和會開會期間，胡曾要求面晤威爾遜。當時因為各國要求自決權者蜂湧而至，紛紛提出同樣的要求，可惜威爾遜心餘力絀。最後巴黎和會決定：不容許民族自決。胡氏對威爾遜的信心至此破滅，向西方列強求援的迷夢，也因此蘇醒過來。

詳見：Jules Arocher, *Ho Chi Minh: Legend of Hanoi*, New York, Crowell - Collier, 1971, pp.10~11.

<sup>72</sup>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四講。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被殖民及被外族統治或租借的地區民族主義的核心理念。

不過，自決的目的不止於自決，而在自決以後，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事實上，這些民族在其「民族」本身並無太大的問題，問題是他們被外國力量壓迫，被他族統治，沒有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因此才要求「自決」，自己決定自己民族的前途。

自己決定自己民族前途的風潮傳入積弱的中國，問題立刻複雜起來。民初以來即受到列強鼓煽的蒙古、西藏、滿洲、新疆等地，離中國他去的動作此起彼落，五族共和與五族一家的論調原來祇屬過渡性質，如今再加上自決的浪潮，各族極可能「乘風」求去。爲求因應，在理論上，孫中山對內的民族主義，不得不再做轉變。

惟民國初年孫中山民族主義的考慮重點並不在國內，而在國際。民國建立不久，自臨時大總統職位卸任的孫中山，一直在困厄挫折當中。除了袁世凱等人的君主迷夢及割據互鬥之外，列強並不會認真地重視過孫中山。一個不被對方重視，內心又希望對方重視而且援助的人，絕不會公開宣稱：「我要反對你！」

此外，當孫中山因二次革命不成亡命日本之時，<sup>⑭</sup> 在政治思想的傳播上，中國似已逐漸取代日本，成爲新的集散地。此種情景，尤以廣州最爲顯著。廣州可以說是兩廣的政治、文化、經濟以及社會中心。它靠近香港，又是中國國內開風氣之最先的地方，無形中就成爲東部亞洲地區人文薈粹之地。中南半島及朝鮮半島上各個被殖民國家的新領袖，多集中於此，以及桂林、南京兩地，<sup>⑮</sup> 並與孫中山、黃興、陸榮廷、龍繼光、以及廣西巡閱使張鳴岐相往來。中國轉而贊助中南半島各地新興力量，特別是安南國民黨等展開反法革命活動。

中國，特別是以革命黨爲首的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在受到列強政治、軍事壓迫，力圖奮起的同時，也支持朝鮮、安南等殖民地，展開反帝活動。<sup>⑯</sup> 這個事實，使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特別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內涵，有了更加深刻複雜的內涵：一方面，他對內呼籲境內所有各族的大團結，另一方面，他陰助鄰近地區革命黨人爲自己民族的獨立建國而努力。此時的孫中山雖然未將反帝的口號掛在嘴上，

<sup>⑭</sup> 民國三年六月中華革命黨組黨。七月八日，正式成立於日本東京築地精養軒，「共圖三次革命」。見：「中華革命黨宣言」，革命文獻，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印，輯5，頁2。

<sup>⑮</sup> 例如法國駐香港總領事 G. Liebert，於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即曾通知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安南大批叛黨潛伏廣州、桂林、南京。詳見：“Menees des rebelles annamites dan les Deux Kouangs et a la frontiere du Tonkin,” Le Consul General de France a Hongkong a Monsieur le Gouverneur General de e'Indochine, Hanoi, le 17 Mars 1914.

<sup>⑯</sup> Ibid.

但在實際的行動裡，其聯合弱小民族，以反抗列強的作法，則更具體表達了他內心的意願。

##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法、德等國在華勢力漸由美、俄、日三國所取代。三國之中圖我領土者，又以俄、日兩國為最。兩國侵略方式不同，前者透過外交，後者走軍事路線，但目的則一：均在犯我邊疆。美國當時較少領土野心，但留美返國學者，大力宣揚美式意識形態，並於五四運動前後，成為新的領導人，打算從本根文化改造中國，推動全盤西化。

面臨西方民族如此強壓及引誘，中國精英的反應相當激烈，亦十分紛歧。惟大體而言，應可分為五大種類：首先是列強懲患下的週邊民族，其領導人如蒙古王公、達賴十三輩、溥儀，他們根本懷疑或否定與漢族的親密關係；其次是教育界陳獨秀、胡適等人，他們發起新文化運動，質疑傳統民族文化；再次為國民黨的提出「中華民族」說；第四為甫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接受蘇俄民族解放的理論；第五為學術界新興的民族學研究，從科學的觀點探討民族認同的問題。<sup>①⑥</sup>

蒙古方面，俟日本勢力進入東蒙，於民國七、八年間發動「泛蒙運動」，邀集內外蒙古、呼倫貝爾、布里雅特合組政府於海拉爾。<sup>①⑦</sup>旋以徐樹錚的脅迫，雖曾一度逼使外蒙於民國八年撤銷自治，但時間短暫，且「重傷蒙人潛在的民族意識」，演成民國九年外蒙的再度獨立。<sup>①⑧</sup>

民國二年達賴十三輩更發表四項決議，擬藉力英國，驅逐在藏漢人。<sup>①⑨</sup>甚至在西姆拉會議上，罔顧史實，主張「中藏兩國向無藩屬關係，將來亦不願相互維繫」，同時決定西藏為獨立國，<sup>①⑩</sup>明顯走上族國主義之路。後因感於英人對藏之步步侵略，在尼泊爾攻藏之後，才漸次覺悟，於民國十八年開始，在南京設立辦事處，同意將外交、國防、交通統歸中央政府掌理。<sup>①⑪</sup>但就西藏本身而言，在長期孤立的態勢被打破之後，難免不受外國的影響。從而亦相對地希望疏遠與中央的關

<sup>①⑥</sup> 朱宏源，「民國以來民族主義的演化」，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台北，民80，頁138。

<sup>①⑦</sup> 李毓澍，「從蒙共六十年來演變對外蒙現況的探討」，蒙古專題研究叢書，台北，蒙藏委員會，民74，頁2~3。

<sup>①⑧</sup> 李毓澍，「民八外蒙撤治問題癥結的探討」，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台北，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民70，頁355。

<sup>①⑨</sup> 參見陳素主，「十三輩達賴喇嘛與中央關係之探討」，政大邊政所碩士論文，民79，頁81。

<sup>①⑩</sup> 「西藏議約專員陳貽範函」，西藏議約案，北字第五八九號，第四函第九冊；參見薛榮祥，「西藏民族政治意識之研究（1912~1988）」，政大三研所碩士論文，民79，頁44。

<sup>①⑪</sup> 吳忠信，西藏紀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42年，頁3。

係，強調地方內部的整合與統一。<sup>82</sup>

滿洲方面，民國以後深受日本陸軍及大陸浪人所謂「滿蒙獨立運動」的影響。<sup>83</sup> 民國以及洪憲帝制時期日方策動的兩族獨立運動，雖未得逞，但「滿洲國」的雛形已逐漸形成。<sup>84</sup>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日本卵翼慫恿之下，末代皇帝溥儀成爲「滿蒙獨立」計劃下的犧牲品。

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愛國運動，雖以民族排外的情緒發端，但此種民族主義運動的最大表徵，在排拒傳統。胡適極力提倡求新與思想自由，希望由此帶動中國新思潮，<sup>85</sup> 骨子裡崇尚的是美式實驗主義哲學。<sup>86</sup> 陳獨秀更急進，以科學與民主爲號召，謀摧毀固有的傳統與文化，達成改造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傅斯年亦於民國七年撰文，認爲中國學術思想與西學杆格不入，因此不能吸收西學之長，故而主張「去此基本誤謬」。<sup>87</sup> 五四時期的這些急進知識分子，因憤於中國的積弱，外侮的急迫，復痛恨軍閥政客的誤國，堅信固有傳統是現代化的障礙，爲一意求新，遂主全盤澈底西化，儘可能地摧毀固有的一切。<sup>88</sup> 身處中國積弱之最，面對著列強接二連三的鯨吞蠶食，五四運動的愛國熱忱亦最高昂，但此愛國主義的手段無疑根植於對傳統的懷疑、對現狀的不滿、對自我民族的鄙夷，雖然終極目的依然放在國家民族的繼絕存亡上面。<sup>89</sup>

民國八年，孫中山公開揚棄五族共和的主張，同時反對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他說：<sup>90</sup>

我國人自漢族推覆滿清政權、脫離異族羈厄之後，則以民族主義已達矣；更有無知妄作者，於革命成功之初，創爲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而官僚附從之。且作清朝之一品武員之五色旗，爲我中華民國之國

<sup>82</sup> 海耶爾，「中國邊疆——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日本在西藏之活動」，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史討論集，冊2：開國護法史，頁511。

<sup>83</sup> 林明德，「民初日本對滿政策的形成」，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史討論集，冊2，頁574。

<sup>84</sup> 同上，頁588。

<sup>85</sup> 李國祁，「甲午戰後至抗戰以前我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史討論集，冊2，頁17。

<sup>86</sup> 耿雲志，胡適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頁72。

<sup>87</sup> 傅斯年，「中國學術思想之基本誤謬」，新青年，卷4號4（民國7年4月），頁328~336。

<sup>88</sup> 李國祁，「甲午戰後至抗戰以前我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同前，頁18。

<sup>89</sup> 這是一個推論上很嚴重的謬誤。五四運動要以否定傳統、否定現狀，作爲救國的方法，以繼絕存亡。但是，就理論上言：在否定自我之後，自我已經不存在。既然自我不存在，就沒有必要再去奮鬥了。所謂「繼絕」「存亡」，根本就是矛盾的。

<sup>90</sup> 孫中山，「三民主義」（1919年），國父全集，民國78年版，冊2，頁334-335。



旗，……。此民國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

此外，他進一步提出一個新觀念，來取代「五族共和」，這就是「中華民族」。他接著說：

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祇達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目的為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

民國九年，孫中山再提揚棄五族共和的主張。再次呼籲仿效美國，組成「中華民族」。當年十一月四日，他說得更清楚：<sup>①</sup>

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為世界最有光榮的民族。）我們中國許多的民族也只要化成一個中華民族。並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後民族主義乃為完了。

這幾段話裡面，蘊涵了多種意義：

- 一、否定以前所倡的五族共和說。
- 二、認清中國境內民族種類極繁，遠超五種。
- 三、不呼應當時的世界潮流，不強調國內民族「自決」。
- 四、改提中國之內祇有一族的理論。並以美國為例，認為「多民族」所組成的美國，現在祇成「一個民族」。
- 五、境內許多民族都要化成一個民族。
- 六、把所有民族都化成中華民族之後，民族革命才算完成。

民國十年孫中山北伐到了桂林，於十二月十日對滇、贛、粵三省軍隊演講，指出這次北伐是再造新民國。強調完成革命事業需要革命精神，這種精神即軍人精神。但是在這篇演講之中，他進一步批判五族論。他說：<sup>②</sup>

今則滿族雖去，而中華民國國家，尚不免成為半獨立國，所謂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語！蓋藏、蒙、回、滿，皆無自衛能力，發揚光大民族主義，而使

<sup>①</sup> 孫中山，「修改章程之說明」（1920年11月4日），國父全集，民國71年版，冊2，頁379。

<sup>②</sup> 孫中山，「軍人精神教育」（1921年12月10日），國父全集，同上，冊2，頁491。

藏、蒙、回、滿，同化於我漢族，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是在漢人之自決。

這段話措詞強烈。在他的心目中，漢族是中國境內唯一具有自決能力與自衛能力的種族；漢族在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形成的過程中，扮演最高且無法由其他種族取代的角色；其他種族實難與漢族相埒。孫將這些種族與漢族之間，劃了一道鴻溝；對前者，有相當程度的輕蔑。他說：清朝時代，滿清之於中國，是「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以野蠻人壓制文明人」。這種情況，「在理在勢，均所不可」，因此決心革命。<sup>⑬</sup> 俟共和革命之後，滿族雖已「排斥」，但是代滿族而起而「虎視眈眈」者，「正復繁多」。這些種族為何？蒙古族？藏族？……抑或竟是漢族？依孫之見皆不然。孫中山這裡所憂懼的，反倒是漢族的無法重振，而將亡中國的，則是外族，也就是西方的列強。他們侵凌東方，吞併了許多民族。例如「緬甸之征服於英國、安南之吞併於法國」。<sup>⑭</sup> 依照孫的講法，英法兩國之於緬、越，似可與滿之於漢相比擬。可見漢族為其民族思想的最終關懷，不證自明。

以漢為核心，「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一大民族主義的國家」<sup>⑮</sup> 則是他的民族思想的最高層。這套想法，於民國十年三月間成形，其中還涉及美國經驗。他主張我國向美國看齊「合英、荷、法、德種人同化於美而成」。因此，孫中山主張中國國民黨應以美國為榜樣，來宣揚民族主義。他接著說：<sup>⑯</sup>

今日我們講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

這種說法，或許會遭人非議，謂孫中山偏愛漢族。孫中山也注意到這一點。不過，他還是堅持以漢族為中華民族的核心。他是有理由的。孫中山緊接著又說：<sup>⑰</sup>

或有人說五族共和揭櫫已久，此時單講漢族，不慮滿、蒙、回不願意嗎？此層兄弟以為可以不慮，彼滿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無自衛能力底表徵。然提撕振拔他們，仍賴我們漢族。兄弟現想得一個調和的方法，即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並且為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建國底機會。

原來他有數種考慮。首先，他認為漢族本身已經十分巨大，且足以自立。其次，他

<sup>⑬</sup> 同上，頁 479。

<sup>⑭</sup> 同上，頁 490、491。

<sup>⑮</sup> 孫中山，「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1921年3月6日），國父全集，冊2，頁404。

<sup>⑯</sup> 同上。

<sup>⑰</sup> 同上。

還顧及滿、蒙、回、藏已經分別受到日、俄、英三國的威迫與利誘。為吸引這些種族重返中國，孫於開始的時候不得不祇考慮漢族。他如此做，在今日看，氣度似嫌狹小，眼光也太短淺；但在民初，中國內亂不已，外患頻仍，祇以漢族為中心，無疑最為落實。因此，他最後階段的民族主義，可以說是調和當年政治實況而成的。要「拿漢族來做個中心」，「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來組成一個「完全底民族國家」，以便與美國「同為東西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sup>98</sup>

#### 四、晚年的聯俄容共與反帝

民國十一年（1922）孫中山的北伐，因陳炯明積極反對而失敗。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所部四千餘人圍攻總統府。孫陳從此決裂。孫陳決裂，使孫中山更加孤立，並使聯俄「在所必需」。既然聯俄，容共的想法也在同一時間具體化起來。

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在上海會晤孫中山，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種種問題。孫中山審時度勢，決定改組國民黨。雙方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旋由張繼介紹李大釗參加國民黨。這次會見後，首批共產黨員即加入國民黨。<sup>99</sup>

兩天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上海與孫中山會談，馬林向孫中山介紹莫斯科的情況和共產國際的決定。孫中山告訴馬林：他現在感到與蘇俄建立更緊密的聯繫是絕對必要的。<sup>100</sup>

九月四日，孫中山召集在滬國民黨人舉行改進國民黨會議，參加會議的人，有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五十三人。六日，指定丁惟汾、陳獨秀等九人為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成員。草擬工作於一個半月結束。

民國十二年（1923）一月一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一月二日，公布「中國國民黨黨綱」及「中國國民黨總章」於上海的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並在大會上稱讚蘇聯是宣傳得力的典範。一月二十六日，與蘇聯代表越飛聯名發表「越孫宣言」，聲明：「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

<sup>98</sup> 同上，頁 405。

<sup>99</sup> 丁身尊、李鳳英，「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大事記」，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北平，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 436。該頁指出李之入國民黨係由孫中山介紹。但據張溥泉生先年譜，係由張繼介紹李大釗加入國民黨。

<sup>100</sup> 丁身尊等，同上，頁 437。

且可以俄國為依賴也。」<sup>⑩</sup>民國史上爭議最多最大的聯俄容共政策，自此展開。八個多月之後，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後來被聘為國民黨特別顧問。<sup>⑪</sup>十一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同時公布了「中國國民黨綱草案」。十一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在大本營發表演說，強調要學習「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

在這同時，孫中山對國內各軍系與國外列強的態度很快地轉趨強硬。十二月七日，他接見「字林西報」記者，決心截留關餘，不畏列強炮艦二十餘艘在黃埔集中，準備隨時駛入省府之恫嚇。同時再度積極籌備北伐，電催蔣中正來粵，「詳籌中俄合作之法」。<sup>⑫</sup>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通過。孫中山指出：「這是本黨成立以來破天荒的舉動」，強調要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sup>⑬</sup>大陸學者指出：在這次宣言當中，孫中山「既指出『軍閥橫行』，又指出帝國主義的壓迫，這是國民黨第一次公開把反軍閥和反帝國主義並提寫進黨綱的綱領文件之中。」<sup>⑭</sup>翌日，下令籌辦陸軍軍官學校，指派蔣中正為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並以黃埔舊有的廣東陸軍學校與廣東海軍學校原址為校舍。

一月二十七日，孫中山開始系統講述三民主義，每週一次。反帝、反軍閥、聯俄、容共、黨軍的組成、以及「三民主義」的演講，是孫中山去世前一年政治思想、言論、以及政策上的重點。由於是他晚年的想法，許多人均以之作為孫的思想的總結。事實上，此時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確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但其內容究竟如何？則爭論頗多，特別是在台灣海峽兩岸。

大陸學者大談此一時期的孫中山，極力宣揚他的聯俄與容共。甚至還更進一步，把農工政策也合併過來，逕稱之為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他們認為是蘇聯與第三國際（the Third International）促成孫中山反帝的言論。他們說：「蘇聯和共產國際在這場解放鬥爭中予孫中山最大的幫助，是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協助孫中山完成了國民黨的改組，制定出堅決反帝反軍閥的綱領。」<sup>⑮</sup>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

<sup>⑩</sup> 轉引自：同上。頁 438。

<sup>⑪</sup> 同上，頁 443。

<sup>⑫</sup> 國父年譜，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印，民 54，頁 985。

<sup>⑬</sup>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民國 13 年 1 月），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檔案。

<sup>⑭</sup> 段雲章、邱捷，孫中山與中國近代軍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頁 494。

<sup>⑮</sup> 段雲章、邱捷，同前，頁 492。

十八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決議，確實曾對三民主義重做解釋。在解釋民族主義的時候，指出：<sup>⑧</sup>

民族主義，就是國民黨依靠廣大的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和工商業者各階層，為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及其走卒、為爭取中國獨立而鬥爭。對於上述每一個階層來說，民族主義的含義是，既要消滅帝國主義的壓迫，也要消滅本國軍閥制度的壓迫。

大陸學者將共產國際這份決議與孫中山當年的言論加以對照，發現若合符節，因此更斬釘截鐵，認為：「這個決議對整個三民主義的解釋及其他問題的論點，也都貫穿了依靠人民群眾反帝反軍閥的原則。」<sup>⑨</sup>

大陸學者的看法，的確有根有據。孫中山對蘇聯的興起以及其與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援助，確實非常欣賞與重視，而且主張師法俄國。他曾經說：<sup>⑩</sup>

中國革命六年後，俄國才有革命。俄國革命黨不僅把世界最大威權之帝國主義推翻，且進而解決世界經濟、政治諸問題。這種革命，真是徹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

在當年看來，俄國革命是成功的。孫中山因此進一步提出其對俄國革命成功良好方法的見解。他說：<sup>⑪</sup>

當俄國革命時，用獨裁政治，諸事均一切不顧，祇求革命成功。其最危險時期，為十八面受敵，各國均派兵到俄國，其國內之反革命派，亦深受各國援助。故俄國六年前之奮鬥，均為民族主義的奮鬥。……故現在俄國對於贊成民族主義諸國，均引為同調。

他一方面指出：俄帝革命之初，亦遭受列強的入侵與壓制，但俄國人一力反帝，故能成功地建國；二方面強調：俄國之所以成功，其動源在民族主義；三方面更明言：今天的俄國反過來贊助世界各地之主張民族主義者。

藉著俄國的大力資助，孫中山開始有信心起來，決意仿照俄國方法，重新革命，因此，聯合俄國容納中共，重組國民黨，並且發佈第一次大會宣言。在宣言中

<sup>⑧</sup> 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北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81～83。

<sup>⑨</sup> 段雲章、邱捷，同前，頁494。

<sup>⑩</sup> 孫中山，「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民13.1.20），國父全集，冊2，頁616。

<sup>⑪</sup> 孫中山，「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民13.1.20），國父全集，冊2，頁619。

以尖銳的口吻主張反帝，並且強調決不能妥協。他解釋說：<sup>⑪</sup>

此次我們通過宣言，就是重新擔負革命的責任，就是計劃澈底的革命。終要把軍閥來推倒，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來解放，這是對內的責任；至對外的責任，是要反抗帝國侵略主義，將世界受帝國主義所壓迫的人民，來聯絡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來解放。我們有此宣言，決不能又蹈從前之覆轍，做到中間，又來妥協。以後應當要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打銷，並且要知道妥協是我們做澈底革命的大錯。

孫的反軍閥反帝國主義言論，不但立即得到蘇聯以具體行動來加以支持，而且變成日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反帝言論的基礎。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M. Karakhan）宣佈放棄在華特權。此一舉動，深得中國朝野的歡心。甫自日本返國的孫中山亦表贊許，並於十二月中發表宣言，指出雖然他本人及國民黨並不同情布爾希維克主義與共產主義，但他樂意與蘇聯交往親善。再者，其所以對蘇聯友善，完全是因為蘇聯放棄了沙皇時代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布爾希維克同意與中國以絕對平等的地位來簽訂條約。<sup>⑫</sup>英國外交人員這份報告，點出了孫中山聯俄容共反帝思想的複雜性。

在此之前，據英國外務省駐日外交人員報告，孫中山亦曾有過反帝的言論。當他在神戶時，亦曾經與日本民族主義者玄洋社黨魁頭山滿談及他提倡反帝主義。頭山滿勸他放棄此一作法。根據頭山滿的講法：孫當時對於自己之所以提倡反帝的理由，是這麼回答的：治外法權與不平等條約的廢止祇係口號，但是，如果沒有它，他無法將國民黨人團結起來。不過，頭山滿補充道：他也完全了解此種作法並不實際，他也無意將之實行。此種宣傳祇是用來將黨在愛國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sup>⑬</sup>

<sup>⑪</sup>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民 13.1.21），國父全集，冊 2，頁 627。

<sup>⑫</sup> Sir R. Macleay to Mr. Austen Chamberlain, Peking, December 29, 1924, (No.828, Confidential,) F. O. 405~247, F 592/194/10, p. 1. 其原文如下：

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a statement signed by leading members of the Kuo Min Tang was issued, explaining in somewhat laboured fashion that Dr. Sun and the Kuo Min Tang were not in sympathy with Bolshevism and Communism and that their friendly attitude towards Soviet Russia was entirely due to the repudiation by the latter of Tsarist Russia's policy of imperialistic aggression towards China, and to the action of the Bolsheviks in concluding treaties with the Chinese on a basis of absolute equality.

<sup>⑬</sup> Ibid., p.2 原文值得照錄：

Sun had replied that the abolition of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the unequal treaties was a mere slogan, without which he could not hold the Kuo Min Tang together, but that he fully realised the impracticability of the scheme and had no intention of putting it into effect. The propaganda was merely used to bind the party together on the grounds of patriotism.

從頭山滿口中得知此一情報的英國外交人員，對孫中山這種口號與行動並不一致的態度及說辭，似乎並未完全採信，但亦非完全不信。馬克里爵士（Sir R. Macleay）為求澄清，乃進一步詢問孫中山的機要秘書陳友仁（Eugene Chen）。

根據馬克里爵士向英國外相的報告，陳友仁回答道：孫中山並非共產信徒，而是費邊社會主義者。但陳亦不否認孫與國民黨確實相信蘇聯有真摯的友誼，因為蘇聯正為一個富強、獨立、而民主的中國在努力，並且以簽定中蘇和約來表達其善意。<sup>⑭</sup>不過，陳接著說：「孫博士無意反外，或者反英，或者傾向布爾希維克。」孫中山確實曾經公開贊揚英國政府的行政方法，他曾經在一、兩年之前，要求英國提供協助，以改革廣東的行政制度。這就是最好的證明。表示他不但不反外，還主動請求外國協助中國。可是，馬克里亦不諱言：陳友仁無法解釋，為何孫中山在私底下懇求英人拔刀相助的同時，竟在公開演講中以激烈的字眼來表達反英的情緒以及反不平等條約。而孫中山「使自己以最直接的方式，來表達蘇聯駐華人員所擬具對簽約國最猛烈的抨擊」，<sup>⑮</sup>更令他無法釋懷。字裡行間，英國外交官顯然認為孫中山的反帝言論，是蘇聯駐華人員「擬具」製作而成的。

但是話說回來，孫中山堅決反帝的背後，無疑是各國對華態度的懸殊差距。在他的晚年，英、美、日等列強，對國民黨的援助，無論如何比不上蘇聯。有了蘇聯的大力贊助，他才能在十二年底再次積極籌備北伐，並且敢於對抗列強二十餘艘軍艦的可能干涉，準備逕行收管廣州的關稅。

到了民國十三年一月，孫中山似乎更加成竹在胸；決定籌組黃埔軍校。五月三日，第一期學生五百人入學。七月，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軍事訓練與農民運動的步調開始緊湊起來。外交方面，其態度亦趨強硬。八月，以嚴厲手段處理廣州商團事件，並於九月一日發表「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指出商團之「叛國」行動，實有英國之帝國主義為其後盾，對英國干涉中國內政提出嚴重抗議。<sup>⑯</sup>十月十五日，廣州革命政府命令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黃埔學生軍、及粵、桂、湘、豫各軍出動，平定商團之亂。

<sup>⑭</sup> Ibid. 原文如次：

Dr. Sun was no believer in Communism. Mr. Chen described him as a "Fabian Socialist." But to be quite frank, he and the Kuo Min Tang did believe in genuine friendship with Soviet Russia .....

<sup>⑮</sup> 原文如次：.....he associated himself in the most direct manner with the violent attacks being made by the Soviet agents in China on the Treaty Power.

<sup>⑯</sup> 丁身尊、李鳳英，同前，頁 445~453。

西南地區穩妥之後，孫中山決定擴大其領域，同時仍舊維持較高的姿態，採用強硬的態度。十一月十日發表北上宣言，主張速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並順道赴日，於神戶演說大亞洲主義，表示：「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sup>⑩</sup>「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sup>⑪</sup>嗣後雖然由於積勞成疾，肝病復發，但在病中仍舊一再重申廢約的決心。其反帝的政策並未因病中止。

十四年二月一日，廣州留守政府發佈總動員令，第一次東征開始。三十五天後，東征軍在蘇聯顧問協助指揮黃埔學生軍、東江農民的配合下，攻克潮安、汕頭，陳炯明逃往香港。三月十一日，孫在遺囑上簽字時，其反帝情緒仍在，藉著汪精衛的筆，他指出「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sup>⑫</sup>

孫中山晚年的最後三、四年，其態度之所以改變，蘇聯革命的成功是第一個正面的刺激；蘇聯的放棄在華特權，則是第一個積極的鼓舞；而蘇聯派遣共產國際代表以及其後協助訓練國民黨黨軍，並提供經費、槍礮、科技，則不啻更爲重要。據美國駐華武官軍事密報指出，累積至民國十五年，自海參威運抵廣州的援助非常之大，計有：<sup>⑬</sup>

槍枝	二十萬枝
子彈	二十億發
礮	一百七〇座
彈	八萬五千顆

另有：五千六百萬盧布（？）貨款，四百萬裝備，以及一座毒氣化學工廠。

此份報告雖然有過份誇大之嫌，但蔣中正所主持的黃埔軍校的建立，其設備、教材、教官、經費以及槍枝泰多來自蘇聯，似屬可信。這個事實，具體說明孫中山的反帝，深與對蘇聯的欣賞、模仿、學習有關，更與蘇聯在軍事、財政兩方面的支援密不可分。

<sup>⑩</sup>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國父全集。

<sup>⑪</sup> 同上。

<sup>⑫</sup> 「國父遺囑」。

<sup>⑬</sup> Sergoef (Representative of Borodin), Report: a) Arms and ammunition supplied in 1926 from Vladivostok to Canton. Quoted from "Report No.6049," January 28, 1927,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China, Reel XI. 本份報告係自俄國大使館中截獲者，但似有誇大的嫌疑。



但是，根據美國學者的發現：蘇聯當時玩的是兩面光策略。其政治局於一九二三年三月，以二百萬金盧布經援孫中山。<sup>①</sup>到了六月間，政策內容轉趨複雜：派遣五名俄國軍官抵華，並遣加拉罕赴北京，任務是：與北京政府談判，建立互相承認事宜。同一時間，又派鮑羅廷至廣州，擔任孫中山的顧問。鮑羅廷的任務是：「幫助孫中山改革其政黨以及其運作方式，使之變成有效的革命工具。」一方面與北京示好，一方面陰助另一股較小的勢力，來加以鉗制；加拉罕負責在外交上與北京政府，鮑羅廷負責在軍事上資助廣州以推翻北京政府。<sup>②</sup>軍事支援之中，尚包含下面各項：支持以農民參與武鬥；避免孫中山與其他軍系合作（包括離間孫與陳炯明的關係）；以及儘快在國民黨正式文宣中，形成廣闊的民族革命陣線。<sup>③</sup>

根據這些指示，鮑羅廷圓滿達成任務，既成功地改組國民黨，復代擬國民黨宣言、組織法、以及具體辦法，<sup>④</sup>又離間孫中山與陳炯明，成功地假手東征軍，消除了陳炯明的力量。

民國十三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鮑羅廷每月補助國民黨黨部三萬墨元（Mex）。六月，更進一步勸服孫中山，組成政治委員會（Political Council），由鮑羅廷的親信擔任，以參與機要，影響重大決策。自此開始，一直到孫中山去世之後，鮑羅廷透過這個委員會，成為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sup>⑤</sup>在他的手下，有成群的中共黨員、第三國際份子（如越南的胡志明）、<sup>⑥</sup>以及數十位俄國軍事顧問。軍事顧問當中，參與東征陳炯明者就有二十五位。<sup>⑦</sup>

俟黃埔軍校建立，孫中山去世，蘇聯援助中國的兩面手法，又有更進一層的發展。據美國駐華武官報導：於軍援黃埔國民革命軍及中國國民黨的同時，亦經援中國共產黨二千二百萬元；經援與軍援馮玉祥國民軍兩億五千萬元。<sup>⑧</sup>其數額之龐大，雖難遽以全信，但用以證明俄人居間上下其手，則極充分。

在這麼多重的內幕之上，再來檢視俄國當年援華、援孫的基本動機，以及其事後輸出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作法，即可得到更進一步的了解。從這份了解，再看

<sup>①</sup> C. Martin Wilbur, "A Different Kind of Missionary: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in the 1920s,"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New York, M. E. Sharpe, 1988, p.7.

<sup>②</sup> *Ibid.*, p.8.

<sup>③</sup> *Ibid.*, p.9.

<sup>④</sup> *Ibid.*.

<sup>⑤</sup> *Ibid.*, p.10.

<sup>⑥</sup> 胡志明與張太雷等隨同鮑羅廷來到廣州，擔任鮑的「翻譯」。

<sup>⑦</sup> C. Martin Wilbur, *op. cit.*, p.11.

<sup>⑧</sup> "Report No.6049,"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op. cit.*

孫中山晚年的民族主義主張，才能明白：決不可單從孫中山反帝言論的表面來論斷孫中山晚年的民族主義，因為聯俄容共的主張，其背後似乎有一隻由鮑羅廷所操縱的看不見的手。孫中山晚年言論著述之中，何者出於鮑手，何者出於己意，則更值得注意，必須加以釐清。如果沒有釐清這是很困難的工作，錯把由這隻看不見的手製作出來的文字，看成孫本人的真正想法，則其間的差距，將不可以道里計。

### 結論：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核心成份

孫中山民族主義，一如前言所說，可以分作對內與對外兩部分，而且其內涵是如此的複雜而多變。惟整個看起來，可以分作四個時期。在這四個時期之中，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不論是對內的部分或者對外的部分，都有相當大幅度的變動。本文根據新近發現的英國、法國、美國的檔案以及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發現他的民族主義整個看起來，可以說前後一共有六次變化。

就對內的部分而言，變化最多，前後共五次：從反滿的種族觀念，過渡到兼有反滿與親滿傾向的短時間的矛盾，再變成激烈的排滿主義，<sup>⑭</sup>之後，再一百八十度轉彎，成為五族共和論，最後，又變為以漢族作為中心的中華民族說，要求各民族均化入漢族。<sup>⑮</sup>作為一個漢人，對於孫中山以漢族為中心所闡發的民族主義，或許會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任何的不妥。但若站在一個更高遠的位置，重新考慮孫的思維，甚至站在滿族的立場，或者其他週邊民族的立場，則孫的民族論點自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孫的民族主義在學理上以及實際上，都有可議之處。他對於漢族以外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了解，事實上是不夠的，因此，隨著時間的推演，他對中國國情，以及境內各民族的了解增加了，民族主義的內涵也隨著改變。

然則睿智如孫中山者，為何會有上述的盲點，以致主義的內涵多所轉折？則不啻更值得推敲。

首先是主觀意識形態的局限使他無法完全超越。在基本論點上，孫中山對內的民族主義之內涵，仍舊脫離不了對漢族的關懷，以及對其他各民族先入為主的歧

<sup>⑭</sup> 朱滋源，「從族國到國族：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思與言，卷30，期2，頁81.6，頁11～16。

<sup>⑮</sup> 同上，頁27。

視。所謂「華夷之辨」，形成漢民族的傳統民族觀與政治神話，於二千多年的潛移默化之後，對其週圍民族，自然而然存在貶抑的刻板印象。此種傾向，在許多人身上昭然若揭，孫中山亦不例外。

其次是客觀的事實極為冷酷，但必須面對。在清末民初的時候，中國人之中，漢族與滿族人口比例太懸殊。漢人太多了，幾乎是滿人的兩百二十倍。<sup>⑩</sup>在如此懸殊的比例之下，作為漢人之的孫中山，很容易受到影響，在考量時，極難把滿人提昇到較高的，可以和漢人等量齊觀，平起平坐的層次。

再次是歷史的因果，由於漢人曾受滿人統治兩百多年，其間被壓迫的情事自難勝數。這麼多的人被這麼有限的人口統治，必然會有許多不公平之處。不公平會帶來憤懣。在統治有效的時候，軍事與政治的高壓手段尚能鎮壓憤懣。等到統治力量鬆散，長時間的積壓會自然流露出來，成為一股情緒性的反彈。

最後亦應注及地理的因素。由於兩廣距離北京甚遠，向心力相對降低，反彈情緒則相對濃烈。孫中山是廣東人，而且就住在臨海的香山縣。這樣的地理位置，有助於接受海上傳來的外國思想與文化，亦有助於傳播禁忌的思想。

如果再加上海外僑居地，則地理位置更遙遠，而程度亦更加濃烈。海外華僑在國內已深受漢人反滿意識所薰陶，出了國之後，既無清朝政府的保護，又遭遇到當地殖民政府與土著的壓制，內心的不快自然倍增。除了深惡土著的迫害之外，亦不免對祖國的滿人政府懷有憤懣之意。

孫中山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他對內的民族主義自然難免偏執。這種偏執，終其一生仍未完全消除。但是，從驅滿、排滿，到五族共和與中華民族，這些彼此完全相反的理論背後，似乎可以看到，孫中山並非真正固執於漢族的絕對優越性，他並不十分介意種族問題。他對種族問題所提出的意見，一方面不合民族學的原理，不合當年的實況，另一方面他也沒有任何的堅持。由於變動如此容易，顯見這些主張都是權宜性的，可以調整的。

然則孫中山對內民族主義前後五次的變化之中，是否有著某種一貫的核心理念？

查清末民初時節，國運長期衰微，政治動盪不安，在這種惡劣局面之下，國家危如累卵。因此，孫中山的首要憂慮，自然不在種族問題一個單項，而在國家社稷

<sup>⑩</sup> 卞鳳奎，「論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的人口問題」，台北，中國大陸研究，卷32，期8，民79年2月，頁49。

的整體上面。因此，為數「甚少」，曾在清代壓制漢人，在清末民初受列強蠱惑，亟思離異的滿族，以及蒙古、西藏兩族，一時間自難成為孫氏關懷的重點。

事實上，最重要的應該是孫本身關懷的重點究竟是什麼。他真正關懷的，是整個的中國，是國家的命運。為了力挽狂瀾，拯救國家於危亡，孫才會提出許多的主義。這些主義，其實都祇是孫中山救亡圖存與建國的工具而已，絕不是他的終極目的。而民族主義就是其中之一。從這一點來回想他多次的轉折與困惑，極易發現其略嫌粗糙、因時轉移、不合學理各種民族主義說辭，均圍繞在這個救國的基本動機上。<sup>⑭</sup>

如果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民族」主義者，那麼，理論上來說，他應該會支持想獨立的民族（或種族）去獨立，想自治的民族（或種族）去自治。事實證明不然。他不要讓那些亟欲獨立他去的外蒙、西藏、滿洲等遂其所願，反而舉美國為例，希望中國境內各族互相大鑄合大混血。因此，他並非真正的民族主義者，而應是國家主義者。他排滿，是為復興中國；「驅除韃虜」，為的是復興中國；「廢滅韃虜清朝」也為的是復興中國。因此，一旦清廷倒台，他立刻改變口號，改成「五族共和」、「中華民族」，為的也是復興中國。

由於自始至終以國為念，他的民族主義的內涵，就會因時移轉。本文發現，他的轉變十分之大，不但前後相當不同，互相矛盾，甚至能公開抨擊自己以前的說法。環境變遷太快，中國革命又激烈，使得孫中山在清末有三種心態，到了民元之後連續又再做兩次轉折。聰明如孫中山者，所提出民族主張如此變化莫測，即可看出孫中山對內民族主義內涵之複雜，以及策略上的高度「隨機性」，理論演繹轉折上的「徹底性」與「兩極性」。<sup>⑮</sup>其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變動，就是因為它不過祇是一種工具，是一種策略，其間具有高度的冒險性，有時甚至是違乎常理的。<sup>⑯</sup>為了達成最高的目的，所需運用的工具自不僅止於一種。為了救國與建國，祇要符合實際需要，變換工具與策略又有何妨？！

然則孫中山既以復國建國存心，其對種族主義的訴求，在民國建立以後，自然不再具有急迫性。於建國始終「尙未成功」的十四年之中，統一全國與排除外患變成第一優先。在國內，民族問題對顛沛流離的他而言，並非燃眉之急。在這樣的情

<sup>⑭</sup> 朱滋源，「孫中山對內民族主義的轉折與困惑」，同前，頁9。

<sup>⑮</sup> 參見：朱宗震，「論民初五年間孫中山的謀策」，廣東翠亨，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1990，頁12，16。

<sup>⑯</sup> 同上，頁11。

況下，重新強調民族主義，「決非主要是為解決國內民族平等問題的」。<sup>⑭</sup>爭取與國，把民族主義改成國族主義，以國家作為民族的範圍，是孫中山的基本立場。

因此，就對外的部分來說，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到了晚年才有重大轉變。早年為了爭取與國，孫中山必須與西方列強親善。雖然須以親善為原則，但國與國交，互惠平等亦係鐵則，必要的時候，還得以反對帝國主義的形式出現。於是乎，晚年的聯俄容共以反帝，被認為是他的民族主義最後的，同時也是最高的形式。反對各種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聯合俄國並爭取日本的奧援，變成他在世最後數年努力的目標。而為其民族主義的第六變。然而，這一次的變化，使得反對列強的帝國主義與爭取列強的各種支援，成為一體的兩面。這種手法，乍看十分矛盾。但若予以細觀，似可發現其中隱含著對等法則：列強之中，對中國援助多、剝削少者，就給予較友善的回應；其對中國援助少而剝削多者，給予較不友善的回應。因為這五個國家在當年都是帝國主義者，都有侵略他國的事實證據，其中四國以政治、經濟與軍事手段綜合應用，以壓制與榨取中國；另一國則以意識形態外披友善的面貌出現。孫中山對於他們不同的表相、手段、以及實際上的行動，自宜回以複雜，多變，有時甚至理論上互相矛盾的言論與行動。因此，英國外交官會對其私下談話與公開演講的嚴重牴牾提出質疑。俄國的顧問積極地資助孫中山時，他會明言蘇維埃制度不適用於中國。在藉重俄國軍事資源與人才，準備大舉北伐的時候，他又主動聯絡日本，向日本示好。而其和平示好宣揚王道理想的外貌之下，又摻有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嚴厲警告。<sup>⑮</sup>

然則孫中山對日本的批判與希望，也是一體的兩面。他批判的是日本的過去，期待的是日本的將來。<sup>⑯</sup>在聯俄的表相之下，他更期望與日本聯合。孫中山聯日思想很早即已存在。早在一九〇六年民報「六大主義」中，已指出中日聯合提攜的必要性。聯合日本以振興亞洲，是孫中山民族主義轉成國族主義以後，對外延伸部分的主要內涵。<sup>⑰</sup>它比反帝來得更具體，更有建設性，而以「大亞洲主義」的名義出

<sup>⑭</sup> 沈茂駿，「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幾個問題」，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1990，頁9。

<sup>⑮</sup>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演講中，明白指出日本的實力與野心，其中亦不幸而言中中日往後的發展。他說：

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

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海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

<sup>⑯</sup> 俞辛焯，「孫中山對日態度再認識」，歷史研究，1990年3月，頁150。

<sup>⑰</sup> 李吉奎，「略論孫中山的興亞思想與日本的關係」，孫中山研究論叢，集7，1990年，頁88。

現。利用日本的力量，來振興亞洲（其中包含推翻清廷與建立民國），自始至終是孫中山國族主義對外部分的重要原則。<sup>⑭</sup>

孫中山晚年受蘇俄革命的影響，公開提出反帝口號，亦係國族主義而非民族主義向外的表現。其中，除了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外，又包含「濟弱扶傾」一項。也就是爭取亞洲民族的解放。自一九〇五年開始，孫中山曾經直接支援菲律賓、朝鮮、越南三個殖民地的反帝鬥爭。一九〇五年與潘佩珠見面時，即清楚表示：「其結果則欲越南黨人加入中國革命黨。中國革命成功之時，則舉全力援助亞洲諸被保護國同時獨立，而首先著手于越南。」<sup>⑮</sup>民國十三年，越南光復會黨人，於中國國民黨陰助或者默許之下，在廣州沙面謀刺法國駐越南總督 M. Merlin；在黃埔陸軍官校草擬越南國民黨章程、黨綱。而胡志明亦於是年自莫斯科來到廣州。<sup>⑯</sup>廣州在此時，隱然是東方的巴黎，世界新思潮在此集散，亞洲各國的建國運動領袖亦在此聚會，顯見孫中山的興亞思想，不但有理論，而且也付諸行動。

職是之故，孫中山多變的民族主義說辭，其核心不變的主脈，應係以中國以及整體中華民族存心的國家民族思想。這種思想，是十九世紀全球性政治思潮主流之一的 nationalism。這種 nationalism 的內涵，會跟隨局勢的演變而做大幅度的轉變。轉變幅度有時大得無法令人相信。例如它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有時與自由主義啓蒙運動結合，有時與保守反動的舊王朝舊貴族結合，有時更與高唱工人無祖國、階級革命無國界的革命性社會主義結合。<sup>⑰</sup>之所以如此，主因整個世界正進入以歐洲為主、美洲為輔的自由民主主義革命的大洪流之中。孫中山早年留學歐美，吸取西方政治新文明之後，轉而傳輸回國。<sup>⑱</sup>由他所傳來的 nationalism，正如 nation、national 這幾個字一樣的不明確，但頗富現代政治精神：既有民族主義精神，復有國家主義、族國主義、國族主義的意涵，它有時又變成民族自決、民族獨立、民族自治的代名詞。但是，變化雖多，不離其宗，仍以救國、建國作為主旨，基本上就是國族主義。

<sup>⑭</sup> 陳瀛濤、王笛，「論孫中山關於亞洲國家反殖鬥爭的策略」，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1990，頁 11。另見：李台京，中山先生大亞洲主義研究：歷史回顧與當代意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 81。

<sup>⑮</sup> 孫中山年譜，頁 75。轉引自：桑兵，「試論孫中山的國際觀與亞洲觀」，孫中山研究論叢，集 7，1990，頁 97。

<sup>⑯</sup> 蔣永敬，「孫中山與潘佩珠」，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1990，頁 21。

<sup>⑰</sup> Frederick Watkins, "The Problem of 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271~302.

<sup>⑱</sup> 張玉法，「孫中山的歐美經驗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1990，頁 12。

另外，還有與市民文化（civic culture）結合的「國民」思想。以 national 為國民，則 nationalism 也可以被譯作「國民主義」，而以具有市民文化精神的「國民」（national）作為訴求。這個時候的 nationalism，已不僅是國族主義，而且也結合了民權主義。從純粹民族——國家的考慮，兼及民主政治的意義。在如此複雜多變的表相之下，孫中山發抒成為各種因時、因地、因事、因人制宜的，與原始的民族主義距離非常遙遠的所謂「民族主義」思想、言論、與行動。明乎此，才能真正了解，為什麼孫中山多變的民族主義，到最後堅持北伐之時，把民族主義解釋成「國族主義」，同時又主張「國民」革命的原因了。<sup>⑭</sup>似乎孫中山的國族主義裏頭，還包括政治革命中的國民思想。

孫中山的國民主義，素來均為學界所忽視，卻係他晚年政治思想的核心要項之一。爰紀錄其臨終前一小段話，以為明證：<sup>⑮</sup>

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跡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

從種族情緒，到國族主義與國民主義結合的漫漫長路，可以發現：以 nationalism 為核心，以建國為目的，正是孫中山「民族主義」不變的精神所在。因實際的需要，而產生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族國主義、國族主義、國民主義、民族自決、民族平等等不一而足的表達方式。<sup>⑯</sup>由於上述名詞，分別代表不同的思想內涵，但都可以統稱「民族主義」，使得民族主義一詞的內涵複雜而富爭議。因此，若要找出最適當的字詞來一以貫之，描繪孫中山民族主義不變的成份，就不可以用傳統的「民族主義」一詞，必須改為以「國家」與「國民」為內涵、「民族」為名義，二者密合而成的「國族主義」。

<sup>⑭</sup> 同盟會初創時，即由汪精衛在「民報」第一號與第二號上撰文申論「民族的國民」，開始傳播「國民」思想。

<sup>⑮</sup> 孫中山，「北上宣言」（民 13 年 11 月 10 日）。轉引自：周世輔、周陽山，中山思想新詮——總論與民族主義，台北，三民書局，民 79，頁 256。

<sup>⑯</sup> 朱滋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頁 285。